

## 面向他者：十六至十九世紀帛琉與歐洲商人的接觸

陳玉萃\*

### 摘要

以往人類學的研究中習慣將外來者的影響視為「干擾」既有文化的要素，但是卻往往忽略了本體文化中如何看待「他者」，以及與「他者」的互動如何型塑其社會關係與文化。本文試圖從帛琉（Republic of Palau）在十六到十九世紀與外來者頻繁的接觸過程中來討論帛琉文化中的「他者性」（otherness），也就是當地人對於「他者」認知的變化如何影響社會文化的變遷。帛琉位於亞洲與太平洋的交界處，其居民屬於南島語系的一支。早期的帛琉人多半是透過航行而來，因此帛琉文化本身對於「漂流者」的人群範疇有相當的開放性。再加上由於帛琉地處三道洋流的匯集地，除了早期漂流者眾，從可追溯的記錄中亦可見，自 1579 年起至 1855 年被西班牙統治為止，約有 90 多艘的歐洲船隻造訪過帛琉，頻率遠高於鄰近的太平洋島嶼。多數的歐洲人來此是爲了商業利益，而在接觸世界資本主義擴張的過程中，帛琉因爲頻繁接觸歐洲來的貿易者以及其所挾帶的資本主義的交換方式，而在當地從對「他者」是含括性的認同，逐漸形成另外一種排他性的我群認同。原有文化中對於「飄流者」此人群範疇的曖昧性，也提供後來的外來者與當地社會在接觸上的彈性。本文將以筆者的田野材料以及歷史文獻的爬梳來說明帛琉對外接觸的過程中，與不同時期的「他者」之互動如何影響帛琉人對自我與「他者」的界定，進而影響文化與社會關係變遷的性質。

**關鍵詞：**他者性、文化變遷、認同、帛琉、南島語族

---

\*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助理教授。yuping@nttu.edu.tw

位居於密克羅尼西亞的帛琉 (Palau, 當地人發音為 Belau), 在以往的民族誌的描述中, 向來以「擅長接納外來事物」著稱 (Force 1960)。帛琉因為鄰近亞洲, 居於亞洲通往日本的貿易航道上, 同時又位居三道洋流之交匯處<sup>1</sup>, 因此相對於其他鄰近的島國而言, 早期造訪帛琉的船隻相當頻繁<sup>2</sup>, 尤其集中於十九世紀。從歷史文獻中可知, 自從英屬東印度公司由威爾森船長 (Captain Henry Wilson) 指揮的羚羊號 (Antelope) 於 1789 年在帛琉擱淺, 西方世界開始與帛琉島民有實質的接觸之後, 接下來造訪的歐洲商人, 皆透過 Koror 的酋長 Ibadul 來進行勞力與物資的交換。帛琉看似相當順利的接受了資本主義的交換方式, 並且造成往後學者認為帛琉相當容易接納外來文化的印象。然而筆者認為這樣的說法僅僅是以事件發生後的結果來論斷帛琉的社會文化特性, 並無法呈現帛琉當地社會如何因應外來文化的能動性, 或呈現其與外來影響互動的性質。從筆者的田野調查中得知, 一方面帛琉文化中對於外來的「漂流者」一向具有開放接納的特性。當帛琉社會在接觸世界資本主義的過程中是否對於「外來者」的人群範疇有所轉變? 若有轉變, 這些「外來者」範疇的轉變又如何影響帛琉內部的社會關係值得深入討論。另一方面, 以上學者的說法隱含了文化是一個靜態的實體之想像, 而忽略了文化本身即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因此本文欲以帛琉人與歐洲人接觸的歷史過程來討論: 究竟這是因為西方人不斷的出現進行資本主義的交換方式, 從而改變了當地人對外來者的理解、定位與態度 (也就是因為量變而導致質變)? 或者, 原本帛琉文化中對於外來的漂流者 (drifter) 這個範疇本身的曖昧流動性 (可內可外、既內且外), 提供了當地人隨著實際社會情境來重新建構他們和西方人之間的交換方式, 重構了彼此分屬不同人群範疇, 從而有不同的互動樣態? 本文將結合筆者的田野觀察與歷史文獻來討論以上的問題。

## 一、將「他者」放回文化過程

以往人類學研究中所預設的「社會單位」, 是基於成員間的文化相似性, 並且以此建立起一個純粹而單一的自我認同, 成爲一個同質性高的整體。這種基於社會單位內部的「相似性」而建立起的人類學理論, 早在 1959 年 Leach 在緬甸高地的研究中就受到了挑戰。早期持結構功能論的學者所作的研究中認為 Kachin 社會具有一致的社會文化組織, 但是 Leach 發現 Kachin 社會有三種型態: 貢老、貢薩和撣族。這三者之間因為婚配的關係, 而有相互轉變的現象。因此他批評以往的研究往往將研究對象看作是一個穩定、平衡的社會體系, 並進而主張動態的平衡 (Leach 1959)。Barth 亦批判從前人類學的理論往往抱持著文化與族群群體之間具有對應關係之預設, 這樣的觀點可能會忽視某些族群群體的存在。他主張社會群體的界線並非由群體的獨立性來界定, 而是藉由社會過程—也就是排除或合併的機制—所建立 (Barth 1969)。Wagner 則更進一步地質疑「社會群體」是否是社會人類學者自己所建構出來, 以方便對不同社會進行分析的概念工具 (Wagner 1974)。也就是說, 早自 1950 年代中期以來, 許多人類學者開始批判以往人類學者對於「群體」與「文

<sup>1</sup> 北赤道洋流、赤道逆流、與民答那峨海流的交匯。

<sup>2</sup> 根據 Nero 的研究指出, 在 1579 至 1885 年西班牙人佔領密克羅尼西亞之前, 約有 90 艘的船隻來回造訪帛琉, 而且大部分是發生在 1800 年之後 (Nero 1987)。也就是說, 在將近 80 年左右的時間內, 帛琉可能平均每年都有一艘歐洲的船隻造訪。

化」對應的預設，很可能是自己所建構出來分析現象的工具，但無法反應人類社會的實在。但這些批評往往仍然抱持著「文化具有其實體」的預設，因此即便是主張互動論與過程論的學者，在分析上似仍然跳脫不出系統論或功能論的窠臼。

然而在南島語族的社會中，面對接連不斷的移民者是非常普遍的現象，在這樣的社會中若仍然抱持著「文化具有其實體」的預設，可能會導致研究者無法解讀某些文化或社會現象。南島語族多半分佈在太平洋島嶼，這個群體透過精湛的航海技術遷移，甚至來來回回的經過某些地區形成不同波的移民<sup>3</sup>，並在停駐的地點共同組成一個社會群體。這樣的社會性質顯然強烈的挑戰將文化視為單一靜態實體的預設。有些學者已經指出大洋洲社會之特質為相對而言輕視遺傳的或血緣的認定，而強調依據環境或對行為的認可來建立認同。如 Linnekin 和 Poyer 從大洋洲的研究中指出該社會具有兩個特性：一個是社會共同人格特質（*consocial personhood*），也就是大洋洲的個人特質其實是所處社會關係中的一部份。而另一個就是拉馬克（*Lamarckian*）的認同模型—強調一個人的特質必須透過社會關係才能決定。也就是說，個人可以透過環境所賦予的特質、行動、或者是雙親曾有經驗，而獲得群體的認同（Linnekin and Poyer 1990：1-16）。Fox 的研究則進一步指出，隨著不同移民的到來，原有社會中價值的階序性會隨著不同移民先來後到的順序而有所調整<sup>4</sup>。換言之，不同的移民群體進入當地後，就會產生社會價值的競爭與排序，並非永遠有一個最高不變的主導價值，而先來者（*precedent*）往往可以擁有比較多的決策權（Fox 1996）。以上學者的研究所呈現的大洋洲社會性質，除了指出中主要的個人特質或社會關係多透過互動建構而來，也就是說，透過人與人之間的交換而來的社會性才是大洋洲地區的社會實在；此外，亦隨著不斷遷移入該社會的成員屬性，而不斷的修正該社會的價值與秩序。換言之，同質性高、單一封閉的社會單位之不可能，而情境式的社會關係是南島語族界定彼此親疏遠近關係的特色，那就表示「與他者的互動」實際上佔了型塑社會關係與文化很重要的部分。

實際上在 1980 年之後，不少人類學者對於實體、靜態文化觀的反省，以及對於以文化同質性作為研究單位的預設的批判，開始有一些研究者強調當地社會與更大範圍的社會文化之間的互動，才是決定當地人們行為的要素（Munn 1986；Gupta & Ferguson 1992；

<sup>3</sup> 同樣的，從台灣的考古學研究中也說明了台灣的「原住民」有幾波的移民潮，從 3000 年前的大坌坑文化開始應該是最早遷移至台灣的南島語族，之後可能有不同波的移民而形成了台灣各地區分殊化的史前文化發展（張光直 1995）。就現生的台灣原住民而言，也無時無刻的在面對環境中他者的影響。在既有的台灣的原住民社會的研究中，實際上都有著對於他者的稱呼，例如卑南族稱阿美族為 *Amis*，意為北方人的意思，台東平原的族群，如阿美、卑南族都稱漢人為 *bailang*，也就是壞人的意思。陳文德先生曾以卑南族的例子而提出了「卑南族社會文化的形成也得從一個歷史的動態過程中做進一步的了解」（陳文德 2003）。所謂歷史的動態過程所指的是在歷史過程中與不同的外力，例如與不同族群或者殖民政權的互動，如何型塑了地方上社會與文化的樣貌。鄭璋寧曾以魯凱族的 *Taromak* 為例，很巧妙的點出在族群複雜交錯的台東平原，*Taromak* 如何透過在地的族群互動與通婚，建構自身在面臨經濟、國家族群建構中的自我身份與族群認同（鄭璋寧 2009）。有趣的是，這種看似根本賦予認同的族群性是如何在當地交織的不同因素（包括跨地域的經濟與國家力量，以及歷史過程中的異族意象等）中被強化，點出了文化主體與跨時空地域的不同力量之互動過程。鄭璋寧觸及了以往較少從族群上的「他者」如何影響文化主體在文化過程中的在地行動與自我的認同。在族群互動頻繁的東部地區，不論是史前時期或者近史時代，如果忽略了「他者」在文化與社會中的位置，可能難以解讀歷史過程，也難以解釋當代社會文化的樣貌。

<sup>4</sup> Fox 的理論主要是修正 Dumont 所言社會的階序是一組包含對反關係的價值體系，並且有一個最高主導的價值的說法（Fox 1996）。

Tsing 1993)。而另外一個研究取向則是轉向檢視社會內部的主體如何透過與「他者」之互動來建構其社會關係 (Fabian 1983; Stasch 2009 etc.)。如果要放棄對於單一、實體化想像的文化內涵與社會單位的預設，也就是要修正人類學知識在本體論上預設的差異，首先可能必須掌握當地人對於「他者」的看法，也就是該文化中的「他者性」(alterity)。透過社會內部的主體對於「他者」的認知與互動如何建構其社會關係，以及「他者性」是否隨著歷史過程而變遷，並進而反身影響內部社會關係的建構。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去回答該社會文化變遷的性質。因此我選擇以歷史上帛琉居民建構外來者的所屬的社會範疇以及相應的互動方式之轉變，希望藉此一區域歷史民族誌的個案，來重新詮釋該社會文化變遷的性質。

## 二、帛琉的既有研究與背景

帛琉，位於密克羅尼西亞，其居民屬於南島語族的一支，地近亞洲大陸與島嶼東南亞、位居菲律賓與太平洋板塊的交界。帛琉人將帛琉分為兩部分，他們將北方的大島稱為 Babeldoub，當地語意為為上海洋 (upper ocean)，而南方則統稱為下海洋 Yourdoub (down ocean)，包括珊瑚礁島群之洛克群島 (Rock Islands)，貝里琉 (Peleliu)，安高 (Anguar)。此外還有位於西南方的三個小島，其主要居民為外圍波里尼西亞人 (Polynesian Outliers)，語言與文化慣習都與帛琉本島不同。帛琉當地多數講帛琉語，但是相較於其他的核心密克羅尼西亞語 (nuclear Micronesian)，位於密克羅尼西亞西側的帛琉與雅浦的語言顯然無法將之歸類於其中。在 Blust 的分類中，帛琉語跟 Chamorro 語較接近，可能受到印尼或菲律賓的影響 (Blust 1999)，由此顯示出早期帛琉可能與南方的族群有相當的互動接觸。

帛琉一般被認為是母系社會，並且在人類學研究中享有「相當難懂又複雜的社會組織」之稱 (Smith 1987)。以往的研究者多半將帛琉的社會組織分為氏族 (*kabeliil*) 和世系群 (*telungalek*) 兩類親屬群體，然而在實際的社會現況中，這兩者之間的界定並非這麼明確，報導人也經常給出前後不一致的答案。除了這些基本原則，帛琉社會中收養相當盛行，尤其是隔代收養。此外，在不同的儀式場合中，參與的人群也不相同。例如在嬰兒出生禮出現的人群是嬰兒父母雙方的親戚，但在葬禮中出現的某些氏族，實際上跟喪家並沒有血緣關係。由於當地人在解釋誰應該來參加葬禮時，往往會說：「Because they are our relatives」(因為他們是我們的親戚)。當地人以英語稱為 *relatives* 的人群，實際上當地語為 *kauchad*，直譯為「互相的人」之意。或許是因此而導致人類學者 Smith 認為這樣的人群的連結是一種基於對血統 (*blood*) 的想像，並試圖將葬禮的人群範疇與真正有血緣關係的世系群 (*telungalek*)，與可能有血緣關係的氏族 (*kabeliil*)，一起建構為一個階序性的親屬體系 (Smith 1984)。

筆者認為之前的學者之所以認為帛琉的社會組織相當複雜難懂的原因，是因為並未將「他者」視為是一個重要的組成社會關係的要素，而往往試圖將帛琉內部複雜的社會關係都以「血緣」或「想像中的血緣關係」來建立起系統性的解釋，而把那些不能解釋的部分(如收養)歸為「例外」。實際上，在當代被翻譯為「親戚」(*relatives*) 的「相互的人」



(*kauchad*)，與世系群 (*telungalek*) 和氏族 (*kabeliil*) 並非同一類人群範疇，社會功能上也有相當的差異。雖然 *kabeliil* 和 *telungalek* 是否可以翻譯為氏族和世系群有待討論，但是這兩者的組成是基於血緣關係，或者想像上的血緣關係。其中 *telungalek* 是帛琉社會中主要擁有土地的單位，而 *kabeliil* 則是較為廣義的可以繼承土地使用權的單位。彼此規範的人群之間，有著清楚的階序與權利義務關係。而「相互的人」指涉的範疇則相當的廣，包括在口傳歷史中兩家的祖先曾經共同經歷事件，如在危難時給予食物、收養關係、或家族中某成員因故被葬在另外一個家族的土地等事件，兩家族彼此之間就會成為「相互的人」(*kauchad*)。

再者，帛琉母系社會的性質在財產的繼承權與使用權上是分離的。頭銜（也就是酋長頭銜，*chief title*）的傳承來自母方氏族，母方氏族成員也當然的擁有氏族土地的使用權，但因為帛琉社會的婚後居住法則為隨夫居，小孩與妻子都使用丈夫家族的土地，並可藉由參與丈夫家族的活動而贏得額外的土地使用權。簡言之，土地繼承與頭銜繼承是來自母方的氏族，但是其實際的居住地則是依靠夫家／父親家的氏族，在這兩套規則之間遇上了現代的法律體系，這期間的所有權與使用權的混雜與抵觸，也常讓人摸不清其原則。此外，在交換關係上，帛琉人依循同胞關係與姻親關係來進行交換。例如，在每次生命儀禮的籌備中，這一家的媳婦 (*daughter in law*) 必須準備食物，並負責這場儀式現場中所有的服務。儀式結束後，這個家的男性則會付給她們女人錢 (*toluk*<sup>5</sup>) 以表示對她們服務的謝意。如果沒有足夠的錢，男主人會尋求他的姊妹的資助，也就是尋求同胞關係的協助。這種以同胞關係與聯姻關係為主的交換形式，常令人無法掌握人群的性質與交換行為的關係。

同樣地，如果援引「他者」的觀點來解讀這些社會群體的運作，便可以很清楚的釐清上述在親屬或社會組織上令人困惑之處。也就述說，以往被翻譯為「親戚」(*kauchad*) 的人群範疇，實際上是屬於「他者」的範疇。因為不是「自己人」，所以必須與其建立關係，以便在帛琉這個移居地上相互支持以生存，因而形成了相互幫助的人群範疇 (*kauchad*)。這個人群範疇運作於葬禮的參與，或者當家族成員去造訪另一個成員之家族居住地時，可以獲得對方的接待。至於透過結婚而締結的關係，某程度上也屬於「他者」的範疇。因為這些「他者」是「別家的人」，因此他們提供的勞務並非免費。所以家族的人必須以帛琉錢或女人錢來支付「他者」的服務。如果是「自己人」，如白家的兄弟姊妹，就必須協助籌錢來支付別人的服務。這種與「他者」的關係實際上是有所區辨，但也在不同層次上具有相互含括的性質。例如報導人曾說「we are very close, we have the same blood」，這就表示彼此是有血緣關係的親屬。但如果說「we are relatives, because his mother was adopted into our family.」那就表示這比起有血緣關係的親屬，距離稍微遠了些，但是仍然是屬於相互有責任義務的人群範疇。

實際上，帛琉人本身的組成就充滿了「他者」，例如從口傳歷史中經常可發現來到帛琉的人群分成好幾批，而且從南方與北方來的人群在外貌體型上有明顯差異，帛琉人也清楚知道這些差異性如何造成目前帛琉人在外表上的歧異性。然而這個與「他者的關係」在帛琉歷經了相當多次世界資本主義船隻的造訪，以及歷屆外來殖民政權的統治後產生了性

<sup>5</sup> 以玳瑁龜殼所做的盤型狀容器，當地人稱 *toluk*，一般翻譯為女人錢。

質上的變化。十九世紀外來船隻幾乎每年都有一兩艘船隻造訪，而殖民政權更替更是如跑馬燈一般輪番上演。西班牙在 1855 年殖民密克羅尼西亞，1899 年西班牙將密克羅尼西亞賣給德國，1914 年由日本佔領統治，於 1945 年二次大戰結束後由美國託管，至 1994 年才獨立成為帛琉共和國。以往帛琉人多住在大島，但自日本殖民後，日本人選擇大島南方具有深水港的科羅（Koror）作為軍事基地，並將南洋廳設置於該處。在二次大戰後，美國重建科羅的現代建設，也以該處為行政中心，進行教育、金融、政治制度等建設。因為就學就業與醫療的需求，帛琉人從日治時期就開始逐漸移居科羅。二次大戰結束後，約有 60% 的人口居住在科羅，現在則大約有 80% 的人口都居住在科羅以及鄰近的艾瑞（Arai）。目前島上居民約有兩萬人，其中約有六至七千人為菲律賓籍、中國籍、孟加拉籍的勞工。其餘尚有約數百名美國人、日本人和台灣人居住在帛琉。帛琉的族群混雜，不僅自史前時代就有頻繁的遷徙，在當代則受到殖民與市場經濟的影響，大量人群的遷徙與互動一直在重覆地刻畫著當地的社會與文化形貌。

### 三、帛琉早期的飄流者（*meleuaoch*）

由於密克羅尼西亞的島嶼多為珊瑚礁島，面積狹小，因此居住於此的人經常必須航行以尋求新居住地，而以擅長航海聞名。帛琉地處於亞洲與太平洋的交界，是三道洋流匯集的地點<sup>6</sup>，因此經常有海上的漂流者，因為迷路或者船難等飄流到帛琉。當地人以漂流者（*drifter*，當地語為 *meleuaoch*）來指稱那些早期從海上搭乘獨木舟而來的外來者，尤其是因為氣候不佳、被洋流帶到帛琉的人。帛琉人多半都是以開放的態度接納這些漂流者。一位報導人曾說，「今天你是 *drifter*，我們好幾代之前也是 *drifter*，所以沒有什麼差別。」似可說明帛琉人對於 *drifter* 的司空見慣，以及接納的開放心態。

從筆者所收集的帛琉家族的口傳歷史中，亦經常發現該家族的祖先有多元的來源。遷移至帛琉的人群多來自兩個方向，其一是從南方而來，經過洛克群島（Rock Islands）而遷徙到帛琉本島。這些人通常頭髮較卷膚色較黑，當地人認為這些人群應該是從巴布亞新幾內亞遷徙而來，並稱其為 *chad ra Lugile*<sup>7</sup>。其二就是從帛琉大島（Babeldoub）的北邊登陸後，在帛琉本島遷徙，沿路尋找適合的地點定居。這些人頭髮較直，膚色較淡，應為密克羅尼西亞人。雖然早期這些外來者的族群身份可能包含了不同的來源，例如從北方來的密克羅尼西亞人，南方來的可能有巴布亞新幾內亞、印尼或菲律賓人。但是從口傳歷史的描述中，帛琉人早期並無區分外來者的族群，而統一以漂流者（*meleuaoch*）來稱呼。

南島語族社會中經常會依著人群先來後到的順序，建立起社會秩序或者文化價值，並且隨著新的價值進入，新的階序關係又會有所調整，也就是「先例」（*precedence*）的原則（Fox 1996）。在帛琉的例子中也經常發現這樣的情形。這些航行而來的人群，在不同時間來到帛琉，因其先來後到的順序而形成對土地支配的權力支配之差異，並以此形成了村落中氏族（*kabeliil*）間的位階關係。以筆者所收集之 Airai 州的 Oikuul 村之遷移口傳故事

<sup>6</sup> 見注釋一。

<sup>7</sup> *Chad* 為帛琉語中「人」的意思，而 *Lugile* 則為 New Guinea 的當地發音。

為例：

在 Oikuul 這個村子中，最早的定居者是 Oragilu [人名]，意思是滿月。他最早來到 Oikuul，他從 Peleliu 的 Kidele 氏族的所在地，遷移到洛克群島的 Ngechanges，然後才到 Oikuul。他的弟弟，Buigilu，晚一點才遷移過來。他在 Oikuul 外海的 Ngedesoal 登陸。Oikuul 的村人在出海捕魚時看到外海島上的 Buigilu，就回去跟 Oragilu 說，你弟弟來了。他們叫弟弟到村中去，但是弟弟說不要，因為他很傷心，說這些人離開時並沒有通知他。但是哥哥跟他說：你過來，我們會給你一半的土地，給你最大的芋頭田，給你第二頭銜。所以他就到 Oikuul 村中，變成了第二位階的首長。就是由 Oragilu 指定，在村中他可以安排誰住哪裡，有什麼頭銜。他們兩兄弟其實都是漂流者，到了 Peleliu 這個地方的時候，進入了 Kidele 氏族。兩兄弟有很多技能，例如航行、戰爭、捕魚、做網魚的工具等等。在 Peleliu 也因為這些技能而贏得土地跟財產。(報導人 Gilian 2009)

帛琉的村落結構大致上都有八至十個氏族。最高位階的氏族族長，通常也擔任整個村子的酋長，負責分配村中公共土地的使用權。而在位階上屬於一到四的家族族長，則負責村落事務的決策；位階在五至十的族長則負責執行 (Smith 1983)。然而這些氏族間的位階關係並不是不會改變的，例如目前北方的最高位階的家族 Udes，相傳是約六、七百年前在帛琉北方小島 Ngeruwangel<sup>8</sup> 沈船的葡萄牙人的後代。相傳當葡萄牙船隻在帛琉北方的小島擱淺後，他們一開始僅與帛琉人交換食物和飲水，後來就與當地女性通婚，並沿著海岸遷移到 Melekeok 後，被當地最高位階酋長贈與第二位階的家族地位。後來因為能力強且驍勇善戰，晉升成爲 Melekeok 最高位階的家族。這個口傳歷史可由目前該村的舊村落遺址來佐證。在舊村落的遺址中，Udes 家族的石頭平台實際上是位居於第二位階家族的方位。

在帛琉的文化慣習中，該村的最高位階的家族，有義務接待來到該村的外來者，或說漂流者。由最高酋長接待外來者的原因，一方面是外來者進入當地而未告知酋長，很可能被當作入侵者而殺害。另一方面，最高酋長具有管理土地的權力，也必須由他來安排外來者的居住地與耕地。由於接待「漂流者」是最高位階家族的權利與義務，後來很多飄流者也都婚入了最高階的家族，成爲其家族的一份子。因此，在帛琉的最高位階家族中，經常發現有不同族群身份的婚配。從口傳歷史中推知，目前可追溯最早的「歐洲人」婚入帛琉當地的外來者，可能就是上述在帛琉北方小島 Ngeruwangel 沈船的葡萄牙人 (Smith 1983; Nero 1987)。在帛琉當地幾乎每個人都知道在 Ngeruwangel 沈船之葡萄牙人的故事。相傳他們將船上的陶製珠子或手鐲與當地人交換食物和飲水，而這些歐洲製造的人工飾品在帛琉人之間便成了奇貨可居的寶物，也就是後來帛琉人視爲島上最珍貴的「帛琉錢」(udoud)<sup>9</sup>。後來相傳這些葡萄牙人跟當地女性結婚，形成了新的家族，並且一路往南遷移。在筆者所追溯的家族遷移歷史中，在北方最高位階的氏族 Udes 和南方最高位階的氏

<sup>8</sup> 根據對比猜測，這群葡萄牙人可能在歷史時期之前來到帛琉，可能在十五或十六世紀。

<sup>9</sup> 帛琉錢的來源有數種說法，這是較爲可信的口傳歷史的版本，而非神話的版本 (Parmentier 2002)。

族 *Idid*，都是這些葡萄牙人的後裔<sup>10</sup>。

帛琉人與外來者通婚的現象非常頻繁，再加上最高位階家族有責任接待漂流者，因此通婚的頻率更高。在我所收集的晚近記憶可追溯的系譜中，目前科羅州最高位階之 *Idid* 氏族之曾長 *Ibadul*，他的父方之祖父是在十九世紀德國人引入帛琉挖掘磷礦的中國工人，母方的曾祖父則是英屬西印度群島的船員。大約在十九世紀末，*Idid* 家族曾經接待一位英國船長以及他的妻子，是一位來自楚克島 (*Chuuk*)<sup>11</sup> 的女子。這名楚克女子因為懷孕即將臨盆，後來產下一女後難產而亡。英國船長將此女嬰交由給科羅的曾長收養後，便啓程回英國。後來這位英國與楚克女子所生的混血女孩成為了 *Idid* 家族的成員。因為 *Idid* 家族在某一段時間內，適合接任家族內最高女性頭銜的人都因病過世了，因此這名收養的女子便擔任該家族的女性頭銜持有者 (*title holder*) 的位置直到 1972 年她過世。也因此，至今 *Idid* 家族仍有楚克島的親戚 (*kauchad*) 來拜訪。在可見的系譜追溯中，最高位階的家族中幾乎沒有所謂的「純」帛琉人，甚至收養的人也可以繼任最高位階的頭銜。這個現象中凸顯一個有趣的事實：帛琉的人口組成充滿異質性的組合，甚至越高位階家族越有此傾向。而導致最高位階家族中的血統混雜的現象，很可能是因為帛琉人早期對於「他者」的神祕性、異他性所產生的「力量」之崇尚所致。

由於「漂流者」本身在早期就是構成帛琉社會的重要人口組成來源，因此在帛琉的文化慣習中，面對「外來者」的態度一向是開放的，並且試圖將之納入帛琉社會的體系中：不論是透過贈與對方土地使用權以耕作，使其成爲一個新的氏族；或者透過婚入或者收養的方式，使其成爲該家族中的一員。換言之，帛琉這個位於密克羅尼西亞的小島，從早期人群遷移的過程中，到後來面對歐洲因船難而來的漂流者（非因商業利益而來的歐洲人），都抱持接納的態度，在自我與他者之間呈現出一種相當流動以及有彈性的世界觀。

#### 四、新的「他者」：那些歐洲商人

十六世紀，當世界資本主義開始擴張，大量歐洲人往海上尋找商機，亞洲地區的自然資源與香料成爲歐洲人競逐的對象，位於亞洲邊緣的帛琉也因此增加了接觸歐洲商人的機率。而在面對這些越來越頻繁的「外來者」，帛琉人對於「他者」的態度也發生了轉變。根據文獻的記載，自 1579 年帛琉島被德瑞克船長 (*Sir Francis Drake*) 在船上發現後，接下來的 200 年之間都有歐洲船隻不經意的造訪。但是一直到 1783 年英屬東印度公司的船隻「羚羊號」(*Antelope*) 在帛琉的科羅外的烏龍島 (*Uloong*) 環礁擱淺，而在帛琉停留三個月，帛琉人與歐洲人才有較爲實質的接觸，帛琉這個社會也才開始有了相關的文字記錄。科羅曾長 *Ibadul* 當時協助英籍船長威爾森重建船隻，讓他們能順利回英國<sup>12</sup>，隨行的

<sup>10</sup> 爲何這些葡萄牙人的後裔會成爲最高位階的世族，實際上也很有可能是葡萄牙人本身的能力、神祕性、異他性而形成了在地帛琉人的崇敬與畏懼。同樣的，在「外來物」仍是稀少珍貴的年代，歐洲的珠子與手環同樣的也具有神祕性與異他性，因而被當地人視爲珍貴的寶物。

<sup>11</sup> 楚克島 (*Chuuk*) 亦位於密克羅尼西亞。

<sup>12</sup> 在返回英國時，威爾森船長把曾長的兒子李布 (*Lee Boo*) 帶回英國學習語言，但李布不到三個月就病死於天花。後來威爾森船長將李布葬在他的家族位於倫敦的家族墓園中。這個故事在當時被寫成了小說 *The History*



George Keate 也記錄了威爾森船長與帛琉人接觸的過程。

Keate 記載，當時威爾森船長從澳門啓程回英國前，僱用了一名馬來人 Tom Rose 做爲隨從。當羚羊號在帛琉的烏龍島附近擱淺，科羅酋長派遣幾名帛琉人駕著獨木舟前來，威爾森船長要這名馬來人用馬來話跟對方溝通，沒想到對方居然有回應。原來是一名在一年多前因船難而漂流到帛琉島上的馬來人，後來由科羅酋長照顧，並且學會了當地話（Keate 1788：22-32）。也就是說，在這次雙方首度實質的接觸中，剛好有兩名馬來人作爲兩方的翻譯，因此溝通的狀況良好而平順，沒有發生嚴重的誤解。

帛琉人在遇到漂流而來的陌生人時，往往會問這樣的一句：「*al l chad e te mo chedak, e a l chelid e te mo cheduk*」（翻譯：當看到不認識的人，上前釐清，如果是人就是我們的人，如果是神〔或鬼〕就是我們的神）。在帛琉的世界觀中，他們認爲這個世界一半是人，而另一半則是神或鬼這種超自然存在。由於酋長負有照顧村民的責任，因此當酋長遇到不認識的存在時會說這一句：如果你是人的話，那就是我的人；如果是屬於神〔或鬼〕（*chelid*）的範疇，那就是我們的神〔或鬼〕。根據 Keate 所描寫威爾森船長在帛琉擱淺的故事中顯示，這些英國人認爲帛琉人似乎從來沒有看過白皮膚並有穿著衣服的人。當威爾森船長派遣一名員工進入帛琉本島，帛琉人要求英國人將鞋子跟衣服都脫下來，讓他們看看他的身體以及膚色，並且要觸摸看看以確定他屬於「人類」的範疇（Keate 1788）。但或許因爲在兩方接觸時有翻譯的協助，將白人誤認爲「神」的狀況並沒有發生。目前帛琉語中將上帝翻譯爲 *chelid*，意思爲這是「陌生的超自然存在」。西方人被稱爲是 *chad ra ngebard*，*ngbard* 是西方的意思，該句意思爲從西方來的人。也就是確認其爲人類，但是來源與帛琉不同，是來自西方。

然而這次的事件對當地人來說，其意義可能在於島內政治勢力的重整。Parmentier 從帛琉的口傳歷史之分析中指出，帛琉的部落政治一直隨著戰爭的結果而改變。在威爾森船長造訪前，科羅才剛剛以征戰的方式統和了居住在洛克群島的氏族。因此，當威爾森船長在帛琉擱淺時，Ibadul 上前溝通後，他除了答應協助威爾森船長重新製造船隻，同時也要求英國船員們能協助他攻打敵對的村落 *Melekcok*。在毛瑟槍與大砲的協助下，Ibadul 獲得了全面的勝利，同時也將帛琉原本部落間征戰不斷的島內政治，形成南北對立的兩大政治聯盟（Parmentier 1987）。由於 Ibadul 長期與外界接觸的經驗，他知道如何與外人合作以獲得歐洲的物資，尤其是槍枝。他也佔了地利之便，壟斷了與外人合作的機會，以此維持了科羅在島內政治上的領導地位。

在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有接踵而來的歐洲商人前來此地區尋找進行商業貿易的機會。根據 Nero 的研究指出，當時歐洲人來帛琉主要的目的其實是要供應中國市場對於海參與椰乾的需求，而且幾乎集中在十九世紀，平均每年都有一兩艘船的造訪（Nero 1987）<sup>13</sup>。歐洲人也從中國或者香港招募勞工，到印尼與大洋洲開墾的莊園進行農耕，或者採集

---

*of Prince Lee Boo, a native of the Pelew Islands*》（Bryer 1790）。成爲當時歐洲流行的讀物，也成了歐洲認識帛琉的窗口。目前帛琉社區大學前樹立李布（Lee Boo）的雕像，以第一位去英國學習英語與其它知識的帛琉人來代表「學習」的榜樣。

<sup>13</sup> 見注釋二。



當地的礦藏。也就是說，在十九世紀，帛琉開始頻繁的與外界接觸<sup>14</sup>，並且開始被捲入世界性的資本主義體系之中。

在威爾森船長造訪之後，英屬東印度公司將帛琉作為與中國貿易的中繼站（Hezel 1983：75；Nero 1987：234；Parmentier 1987），並派遣了兩艘船隻，Panther 和 Endeavor 號常駐帛琉。雖然作為中繼站的目標從未完成，但是船長 McCluer 認為帛琉有經濟上的潛力，並要求酋長 Ibadul 贈與 Malakal<sup>15</sup>作為其基地，而 Panther 號就往返香港與中國作生意。英屬東印度公司在帛琉活動的期間約是從 1789 年至 1802 年，之後就撤離了。

在東印度公司之後，又有其他逐利的商人開始進入帛琉，欲以歐洲的商品與槍枝來交換海參與椰乾等商品，以應付中國市場的需求。在 1843 至 1866 年在帛琉活動的是英籍船長 Cheyne。1843 年前後，他在密克羅尼西亞活動，首先去了 Pohnpei，後來造訪帛琉希望以此做為熱帶農場的基地。當時尚有西班牙船隻往來帛琉，一年造訪一次或兩次，以收集海參運往中國。這個時期歐洲商人與帛琉人的合作方式，主要是由當地人採集海參之後，透過酋長交給西班牙人以換取歐洲商品與武器（Shineberg 1971：234）。由於科羅是個良好的深水港，因此外國商船多會從科羅登陸，酋長 Ibadul 在歷經了與威爾森船長的接觸經驗後，熟知外來物資對他維持地位的重要性，因此壟斷了所有與外人貿易的機會。當時在帛琉島上的 Cheyne 與 Woodin 壟斷帛琉的海參、龜殼與椰子油的出口，其他的商船要進入帛琉都必須經過這兩人的同意。文獻記載中 Cheyne 是個貪婪的人，後來他也設法讓 Woodin 同意將海參的收取讓給 Cheyne，自己只收取龜殼和椰油，因而迫使 Woodin 遷往 Melekeok 與當地大酋長 Reklai 合作，但最後入不敷出而離開。

在此期間，一位德國船長 Tente 在菲律賓的馬尼拉遇見 Cheyne，兩人洽談海參貿易後，他也來到帛琉。他在帛琉的期間（1862—1867 年），帛琉人與 Cheyen 之間有著緊張關係，因此 Cheyen 帶著海參乾貨前往馬尼拉避風頭，留下 Tente 一個人住在科羅酋長贈與的 Malakal。他記錄酋長 Ibadul 所言「Cheyen 是個壞人，如果你可以禁止他回來，我願意承諾讓我的人民可以賣給你任何東西。這幾年我的人民給他無數的海參、龜殼跟椰油，因為他答應我們讓我們部落成為全島最強的部落。但是他跟我們的敵對部落也做了同樣的承諾，也給了他們武器。而且他也勾引我的妻子……」（Tente 1888：28）。Cheyen 企圖壟斷整個帛琉的海參生產，卻不斷受到 Ibadul 的限制。Cheyne 為了能夠自由的在帛琉各地貿易，而欲扶植北邊與 Ibadul 敵對的村落 Melekeok 獨立，不受南邊 Koror 的鉗制。因而他到處在帛琉各地收購土地，並支付他們槍枝。後來 Koror 酋長 Ibadul 在 1866 年下令暗殺了 Cheyne（Nero 1987：280-289）。這段史實展現出當時歐洲商人利用部落間爭戰的嫌隙，透過武器的提供換取了當地的勞力與物資，並且透過酋長來進行交換。另外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是，Tente 在帛琉生活了一年半，期間遇見當地一位英國籍的人，John Davy。根據文獻，他應該是在 1832 年，在他還很年輕的時候就來到帛琉，然而為何前來的原因不明。後來他娶了當地女性，學會當地語，並且擔任 Cheyen 與 Tente 的翻譯。甚至當 Tente 到 Yap 去收購海參時，也是由此人擔任翻譯（Tente 1888：10）。Tente 記錄到，Davy 已經

<sup>14</sup> 在帛琉國家博物館（Belau National Museum）內陳列可能是明清時期中國製的硬陶，功能可能為酒甕，上有龍型雕塑。在早期德國時期的照片中，帛琉人也用類似的硬陶來收集雨水。

<sup>15</sup> Malakal 是位於科羅外的一個小珊瑚礁島，目前以路連橋聯繫科羅本島。

完全放棄「文明」的生活，也不願意聽到有關英國的一些事情，完全融入了當地的生活。在這段期間，這些外來的歐洲貿易商相當倚賴 Davy 的翻譯以與當地人溝通<sup>16</sup>。

接下來在帛琉活動的商人是美國商人 David O'keefe，他在帛琉或雅浦活動的時間約在 1878 至 1901 年之間。當時 O'keefe 正在密克羅尼西亞與印尼一帶尋找商機，在途經帛琉時，一名雅浦人說服他將這群來帛琉洛克群島採石礦的雅浦人與製作好的石錢用雙桅帆船載回雅浦。回到雅浦後，當地的酋長回報以 60 名雅浦的勞工到印尼 Mapia 種植椰乾。後來雅浦人希望 O'keefe 能持續以雙桅帆船載送他們在帛琉做好的石錢，這樣他們才能製作更大更值錢的石錢。O'keefe 也開始以協助運載石錢來換取雅浦島上的椰乾。根據當時的紀錄，幫忙載送直徑四尺的石錢，可換 100 袋的椰乾，而一袋椰乾他轉手賣 41.35 美金 (Butler 2001: 103-04)。他自 1878 年開始幫雅浦人運送石錢以換取雅浦勞工，以協助他在印尼的 Mapia 的椰乾種植。因此當時他享有食人島之王 (King of Cannibal Island) 的聲望 (Hezel 2008)。但是在既有的文獻中，較少提到 O'keefe 在帛琉當地的影響。

這些商人在帛琉的活動多半在帛琉被西班牙殖民 (1855 年) 之前，往來於帛琉的自由貿易商多半被科羅州的酋長 Ibadul 所壟斷。在被西班牙殖民之後到德國殖民之前的這段期間，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外來者，是一位英屬西印度群島人 James Gibbons。他在 1850 至 1860 年間隨著捕鯨船來到帛琉，後來被最高酋長 Ibadul 收養，並且婚入最高位階的 Idid 氏族。在當時科羅酋長相當仰賴 James Gibbons 來協助他與這些外來的商人溝通。一直到 1883 年去世之前，James Gibbons 擔任 Ibadul 的翻譯以及幕僚，協助 Ibadul 與外來者溝通 (Nero 1987:134)。由於 James Gibbons 來到帛琉的年代已經是十九世紀的後半，當時在島上較為活躍的歐洲商人為 Cheyen 與 O'keef，還有一些零星的從馬尼拉來的西班牙船隻。不過 James Gibbons 對於當地的貢獻，從帛琉國家博物館的展示中指出，除了擔任翻譯與幕僚之外，還包括西方宗教的引入 (特別是 Seven-Day Adventist Church 安息日教會)，以及公共衛生的概念、教育、繪畫等等現代的知識的轉介，可說是早期引介西方知識的重要推手。除了上述幾位對帛琉當地有較深的影響之歐洲商人之外，實際上從十八世紀末期開始，就有許多船隻在帛琉島擱淺，甚至有些船員在船修復後不願離去，就留在帛琉島上生活。這些人後來有些被殺害或者就搭上別的船隻離開，能留下來的人往往成為後來帛琉與外界溝通的重要「翻譯者」，如上述所提到的 John Davy，或更早漂流而來的馬來人。

歸納以上十九世紀在帛琉活動的歐洲商人之較為單面而零星的史料記載可以發現帛琉人與世界資本主義接軌後的因應方式。首先最特殊的是，由科羅的酋長 Ibadul 壟斷所有對外貿易的機會。歐洲商人透過 Ibadul 在島上進行海參、椰乾的收集，這些物品透過 Ibadul 跟歐洲人換取槍支與其他商品，再由 Ibadul 來進行這些歐洲商品的重新再分配。雖然壟斷貿易行為背後的考量可能是政治而非經濟的因素，例如當歐洲商人想壟斷商業利益而欲介入當地政治時 (將槍支給敵對部落)，便引發了緊張衝突而導致了自身的死亡。但也因為如此，在被西班牙殖民之前，帛琉面對世界資本主義的擴張，仍然是透過既有的社會關係

<sup>16</sup> 還有一點很有趣的是，當時酋長 Ibadul 已經有了 George Keate 所寫的《An Account of the Belau Islands》，記錄了威爾森船長在 1789 年在帛琉發生船難的經過，還特地拿出來展示給 Tente 看。但是根據描述，帛琉島上當時並無人能讀英文 (Tente 1888)。

來進行生產與資源的再分配。第二，以往帛琉人對待外來者（所謂的 *drifter*）的方式，從友善，並以收養或婚入的方式納入既有的社會體系，在接觸頻繁的歐洲商業貿易人士後，進而轉變為區隔、隔離的態度。當時來帛琉進行貿易的歐洲人，都被安置在靠近科羅的一個小島，*Malakal*，也就是被「隔離」於帛琉本地社區之外的意思<sup>17</sup>。由於在有限的歷史文獻中，鮮少提及一般民眾對於接觸外來貿易者的態度，以及新的交換模式對當地人的影響，最多被描述的是 *Ibadul* 利用與外人的合作，成功的提升了自己在島上的政治地位。而且交換的模式是透過酋長 *Ibadul* 的安排，以當地人採收自然物資來交換當地人最重視的武器，以及其他歐洲商品（*Nero* 1987：11；*Tente* 1888）。這個描述或許有其局限性，但是起碼根據既有的歷史記載，在殖民階段之前，帛琉人與外來者的關係，由原先將外來者、漂流者的接納入自身的體系中，到轉變為區隔、隔離，並且利用對方的珍稀物品與槍枝來加強自己在既有的社會結構中的地位。這種對於「他者」意象的轉變，當然一方面跟「外來者」進入當地的目的有關，另一方面大量歐洲人的造訪（量變），可能導致帛琉人在對待他者上產生了較強的自我／他者的區隔（質變），但背後涉及的可能是兩群人交換關係的差異而導致自我／他者關係的變化。

## 五、從 *Stranger King*<sup>18</sup> 到契約關係

從帛琉的家族遷徙故事中，可以窺見當時太平洋海上人群遷移的頻繁。也就是說，「外來者」在早期帛琉人的生活中並非罕見的人群範疇。但是當帶有貿易目的之歐洲白人駕著船堅砲利的船隻而來時，往往引起當地居民不同的反應。*Sahlins* 曾以太平洋社會初次接觸西方人時的口傳論述分析中發現，太平洋島民因為誤以為這些陌生人為超自然的存在（或者說，誤認這些外來者為「神」），因此而順服於這些外來力量（*Sahlins* 1981；2008）。*Sahlins* 以庫克船長的例子來討論夏威夷人如何看待這些白人「外來者」。因為庫克船長的船隻前後兩次抵達夏威夷的時間，恰好分別是在 *Lono* 的祭典期間與祭典結束後，從而當地人對於庫克船長及英國船員的理解、互動實踐的性質大異其趣，從被視為神的到來而備受禮遇倒是被視為奪權者而彼此衝突，甚至衝突身亡後屍體被肢解，被當地人視為聖物加以供奉，甚至更成為夏威夷人的神。與此同時，夏威夷女人與英國船員發生性關係而獲得外來物品，進而成為另類的權力來源，回過頭來撼動了夏威夷原有的國王與平民的階序之別與人群範疇。夏威夷居民對於庫克船長的到來這起歷史事件的理解（是 *Lono* 神的來臨或是奪權者入侵），是在既存的文化範疇與社會秩序中被建構的，一方面外來者既是被當地人原有的觀念與實踐所接納，另一方面當地人對於外來者的所屬範疇與對外來物質的挪用，回過頭來對既存社會範疇、結構與秩序造成影響（*Sahlins* 1981）。他以「他者的力量」（*power of alterity*），或者 *Stranger King* 來稱呼這種現象，而且這個現象不只出現在太平洋，也出現在歐洲或者東南亞。

<sup>17</sup> 如今這個小島已經建了路連橋聯通科羅。不過這個區塊至今仍是許多外國酒吧和旅行社的所在，也就是許多「外國人」，包括跑遠洋漁業的船員和美國大兵等聚集的地方。

<sup>18</sup> *Sahlins* 從各地的民族誌的比較中發現當地人對於外來者的力量之敬畏，往往有外來者無論是透過聯姻、暴力、先到、或者區隔的方式獲得權力，並成為當地領袖的狀況，他稱之為 *strang or king* 或“他者的潛力”（*potency of alterity*）（*Sahlins* 2008）。

雖然威爾森船長在 1783 年造訪帛琉，跟庫克船長在 1779 年被夏威夷人殺害的年代相去不遠，但是帛琉人對威爾森船長的對待跟要求，顯然沒有庫克船長的遭遇這麼戲劇化。不過，Sahlins 對於大洋洲島民如何認知陌生人，以及該社會中認知權力是來自於「非一般的」、「來自天堂的」、「非遺傳的」這些性質的描述，在帛琉卻是相同的。在帛琉早期的口傳歷史中，那些擱淺在帛琉大島北方的葡萄牙人，後來成爲了最高位階的氏族；同時他們攜帶的歐洲飾品與珠子，也成了島上最貴重的帛琉錢。這些在日常生活中「非一般的」、「非遺傳」的外來物品或者外來人群，被視爲具有特殊的價值與權力。他們透過帛琉的文化慣習中的收養、婚姻等方式，被含括進入了當地的體系。但由於其與眾不同、非本地遺傳的、總是處於危險狀態的特性，反而形成了當地人建構爲自身「權力」的來源。因此這些被包含進來的差異性，反而使得包含這些差異的群體之權力與地位的提升。

但是當後來帛琉人與歐洲商人較爲密集的接觸之過程中，這些「外來者」很明顯的成爲一種被隔離的群體，並且被「去神聖化」(或去危險化)。在既有文獻中所描述這時期歐洲人帶來的外來物品，其實性質也超越了象徵上的力量與權力。例如毛瑟槍與大砲因爲可用來攻打敵對部落，所以成爲酋長欲壟斷的物資，也是早期帛琉人與歐洲商人貿易的主要媒介物。在與歐洲商人接觸的過程中，也反映出帛琉人是以一種類似「契約」的關係進行交換，兩造各取所需。然而，在階序社會的帛琉，照慣例是由酋長來決定與「他者」的關係。早期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雖然被引入帛琉，但仍是透過當地酋長以既有的支配模式來募集當地勞力採集商人所需的物資，之後再由酋長與歐洲商人進行物交換，然後將換得的物資再分配給當地人。也就是說，帛琉當時仍然是以既有的社會體系來回應世界資本主義的擴張。至於這種對歐洲白人「去神聖化」或「去危險化」爲何會發生？可能的推測是，人群間交換的性質有所改變。早期的漂流者是尋求居住地，必須透過婚姻與收養的方式進入當地社會；而商業資本主義則是以歐洲商品來交換當地大量的自然物資，兩方僅需維持貿易與合作的關係並且隨時可離開。試圖介入帛琉島內政治生態以壟斷交易的歐洲人，甚至遭到暗殺。以往外來者與外來物的「神聖」與「危險性」，在十九世紀初很快的就降到了世俗的實用層面。雖然我們無法得知這種轉變發生的確實原因，但是起碼我們可以得知，帛琉人在十九世紀初就已經熟稔世界性資本主義的運作方式，比其他鄰近地區的時間早很多。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當新的資本主義的交換方式進入帛琉後，雖然產生了新的社會關係—契約關係，但是舊有的對「他者」的開放性仍然維持著，例如 James Gibbons，他是在十九世紀末期透過收養與婚姻的關係被納入科羅的最高位階家族之中<sup>19</sup>，並且因爲他所帶來的許多現代知識，至今仍受到帛琉人尊崇。

## 六、含括與排他的「他者」與自我認同

筆者試圖從田野調查的發現來理解歷史文獻中帛琉與外來者的關係，藉以釐清帛琉文化中的「他者性」，並將「他者」放入對於帛琉的文化過程的考量中。透過歷史的材料與田野材料的交叉對比中發現，帛琉人一開始對漂流者是開放、接納的態度，並且將漂流者納入既有的社會中。然而在最初接觸漂流至帛琉的歐洲人與其商品時，帛琉人崇尚其神祕

<sup>19</sup> 目前科羅最高位階家族的姓氏即是 Gibbons。



性與異他性，並將這些「異他性」視為某種「力量」的來源，反應在對帛琉錢（歐洲珠子）的崇尚，以及對於外來者力量的崇尚（如葡萄牙人的後裔形成目前最高位階的兩個氏族）。後來與大量的歐洲貿易商人接觸後，異他性的神祕性降低，很快的便開始與歐洲商人進行契約型的交換關係。一方面希望點出與「他者」互動的過程原本就是型塑帛琉文化很重要的一環，而另一方面則是希望延伸這個概念來理解對帛琉人對於後來強勢進入帛琉的世界資本主義的因應方式。

人類學者自 1960 年代以來就開始批評關於社會群體的概念可能只是「存在於人類學者腦中的分析概念」，而應該將分析方法調整為強調互為主體與動態的文化觀。也就是說，將「他者」放入文化過程的考慮是相當必要的。有研究者開始強調，當地社區的人類行為實際上是與更大範圍與不同時限的考慮相關的，也就是說，當地的社會生活實際上是由非當地的組織與文化影響所架構起來的（Munn 1986；Gupta & Ferguson 1992）。另一個研究的取向則是轉而著重於社會內部主／客的關係，文化主體如何藉由意識到與之互動的他者，以此產生社會關係。人類學者 Stasch 提出一個明確的概念：『「他者」作為一種社會關係』。他透過當地人的溝通媒介中如何考慮社會距離的遠近、社會關係的時間性以及反身性，以及文化主體如何使用與社會連帶相關的當地語（indigenous pragmatics）當中來理解「他者性」（otherness）。他指出，「他者性」是在大量的互為主體的過程中產生的判斷，應該將「他者性」當做當地社會關係的一種內在特質和實踐，而非如同以往的將「單一整體」與「他者」截然的區分開來，相反的，這兩者應該是相互依存的（Stasch 2009：14）。也就是說，Stasch 對於社會關係的存有之預設與之前文化具有靜態實體的想像不同，並且替「互為主體」與動態的文化觀提供了一個可行的研究方法。

帛琉人對於「他者」的觀念實際上也充斥於日常生活之中。他們認為每個在島上的人最早都是漂流者，因此在對於其他的「漂流者」具有相當的認同與接納，在我／他的區分上相當的具有彈性以及充滿流動性。這些漂流者在帛琉遷移，他們不同地區與不同家族的相遇，為了建立關係，他們稱這些沒有血緣關係的人為「互相的人」（*kauchad*），後來英語翻譯（或說誤譯）為「親戚」。實際上，從帛琉人使用 *kauchad* 的脈絡而言，這個詞指設的是一種透過共同發生的事件而聯結的社會關係，也就是透過事件而與「他者」建立起的社會連帶。當歐洲商人出現後，帛琉人雖然認為西方人是人類，但是與「我群」不同，是另外一類的「他者」（不包括我群）。從一開始將歐洲人的差異（例如所攜帶的歐洲商品）視為權力的來源，到後來與頻繁到來的歐洲商人形成契約式的交易關係。至此，帛琉人對「他者」的概念中似乎才有排他性的名稱出現，而開始以 *chad ra Ngebard*（西方人之意）稱呼之。接著進入德國殖民時期，德國人僱用了一群中國人進行磷礦開採，當地人稱之為 *chad ra Dsoseng*。緊接著殖民帛琉的日本人，則被稱為 *chad ra Siabal* 等。

若以「他者」的角度重新檢視帛琉的行動主體如何面對他者文化的影響，我們或許可以描述帛琉為：帛琉視「他者」為理所當然，因為在早期遷移的過程中，經常遇見「他者」（不論是密克羅尼西亞人或者來自印尼、菲律賓或新幾內亞），並且藉由所發生的事件去跟「他者」建立關係，成為某程度的「親屬」（*kauchad*）。異質的「他者」往往被視為珍貴的資源，而由最高位階的家庭來決定如何對待，並且以將之納入帛琉的社會體系為主要的模式。相對來說，帛琉人對於我群的認定，最小單位就是自己的家族。但是當 19 世紀開



始大量的逐利歐洲商人來到帛琉，很明顯的出現了另外一種形式的社會關係，也就是契約關係。當「將他者納入」不適用於這樣的新社會關係，帛琉人只能以區隔的方式來與這些歐洲商人維持交易關係，形成了一個新的人群範疇。至於帛琉人對於「他者」的意象順利的形成排他性的自我認同。從歷史文獻的解讀中筆者認為，就帛琉例子而言，在歐洲人初次登陸帛琉時，因為有翻譯的協助，因此減少了誤解的狀況，同時也順利地溝通了彼此的需求。至於「翻譯」這個角色的出現，則是因為頻繁的有其他文化的漂流者漂流至帛琉。也似因為一開始就沒有誤解的認知了新的人群範疇，因此新的人群範疇直接創造了新的社會關係，而並不危及既有的社會關係與運作。甚至因為持續的面對頻繁而大量的「他者」，也形成相對於「他者」的排他性的自我認同（即便他們同時也很清楚「帛琉人」本身就是歧異的組合）。這種認同的運作的最佳例子，就是在日治時期帛琉人與日人的混血兒，至今都毫無認同困擾的認為自己就是帛琉人而不是日本人。然而將「他者」含括進入帛琉文化的機制並沒有停止，一直到現在仍然有不同族群的人婚入帛琉當地，並且鑲嵌至當地的社會文化制度中。

在經過了十九世紀世界資本主義擴張的過程中，帛琉人所形成了排他式的「他者」之人群範疇的認知，很可能以此奠定了往後帛琉面臨接連不斷交替的殖民政權的基本態度。而這是一種既有含括「他者」的彈性，卻又有區隔與排他的「他者」意象。反應在實際的社會現象上，當代帛琉人在對其他族群的語言與文化的採借能力上，可能高過於他鄰近的族群，但是在社會組織方面，如透過異性同胞關係建立起的交換體系（*omeluchel*）仍然十分盛行，至今仍然是帛琉社會中最重要的機制。甚至，在市場經濟引入帛琉超過了一個世紀，帛琉人對於交換關係中重要的寶物—帛琉錢（*udoud*）的重視和競逐，甚至更甚囂塵上。從以上歷史過程的分析中，筆者認為，原有帛琉文化中蘊含著對於「他者」的開放性，也就是說「漂流者」這個人群範疇本身的曖昧性，提供了後來的外來者與當地社會在接觸上的彈性。再加上其所處地理位置經常有漂流者來到當地，頻繁的接觸實際上也造就了某些關鍵的「翻譯者」的出現，使得當地人在接觸歐洲人時沒有發生誤解的情況。因為以上兩種因素，造就了帛琉社會與歐洲人的「第一次接觸」之過程中，較為平順而非斷裂的類型。這樣的特性也可用來解釋困惑著以往的人類學者的現象：為何帛琉社會一向被認為「善於接納外來事物」，但帛琉社會中的「傳統」之社會文化並沒有隨著「現代化」的過程而被抹平，反而更加強固的延續至今。既有文化中對「他者」的人群範疇的開放性與曖昧性，提供了帛琉人一方面接納外來影響進入既有社會文化的能力，一方面也透過歷史的過程中逐漸區分出排他性的「他者」範疇，而發展出能與既有的文化相互平行運作的模式，型塑了當代帛琉社會的樣貌。

## 致謝

本文初次於「看見平埔」研討會宣讀，非常感謝評論人鄭瑋寧女士對本文的定位與修改意見。爾後，《南島研究學報》的審查委員和編輯委員都給予本文相當重要的修改意見，筆者在此一併致謝。然一切文責由筆者自負。

## 參考文獻

- 陳文德  
2003 〈民族誌與歷史研究的對話為例：以「卑南族」形成與發展的探討為例〉，《臺大文史哲學報》59:143-176。
- 張光直  
1995 〈中國東南海岸考古與南島民族起源問題〉，《中國考古學論文集》，頁 171-188。台北：聯經。
- 鄭瑋寧  
2009 〈親屬、他者意象與「族群性」：以 Taronak 魯凱人為例〉，《東台灣研究》13：29-74。
- Barth, Fredric  
1969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Waveland Press: IL, US.
- Blust, Robert  
1999 Subgrouping, circularity and extinction: some issues in Austronesian comparative. *In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Eigh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ustronesian Linguistics*. Elizabeth Zeitoun and Paul Jen-Kui eds. Pp. 31-94. Taipei: Academia Sinica.
- Butler, Janet  
2001 *East Meets West: Desperately Seeking David Dean O'Keefe from Savannah to Yap*.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Georgia Southern University.
- Bryer, Henry  
1790 *The History of Prince Lee Boo: A Native of the Pelew Islands*. London: Harris and son.
- Fabian, Johannes  
1983 *Time and the Other: How Anthropologist Makes its Objec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Force, Roland  
1960 *Leadership and Culture Change in Palau*. Fieldiana. Anthropology, Vol. 50. Chicago Natural History Museum.
- Fox, James  
1996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ogenitor Lines of Origin: Patterns of Precedence in Eastern Indonesia*. *In Origins, Ancestry and Alliance: Explorations in Austronesian Ethnography*. James Fox and Clifford Sather, eds. Pp. 130-153. Canberra: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 Gupta, Akhil, and James Ferguson  
1992 *Beyond "Culture": Space,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s*. *Cultural Anthropology* 7(1):6-23.

- Hezel, Francis X., S.J.  
 1983 *The First Taint of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the Caroline and Marshall Islands in Pre-Colonial Days, 1521-1885*.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2008 The man who was reputed to be king: David Dean O'Keefe. *Journal of Pacific History* 43(2):239-252.
- Keate, George  
 1788 *An Account of the Pelew Islands*. London: G.Nicole.
- Leach, Edmund  
 1959 *Political Systems of Highland Burma: A Study of Kachin Social Structur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Monographs on Social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 Linnekin, Jocelyn, and Lin Poyer, eds.  
 1990 *Cultural Identity and Ethnicity in the Pacific*.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Munn, Nancy D  
 1986 *The Fame of Gawa: the Symbolic Study of Value transformation in a Massim Society*. London : Cambridge.
- Nero, Karen  
 1987 *A cherechar a lokeliil: Beads of History of Koror, Palau, 1783-1983*.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 Parmentier, Richard  
 1987 *The Sacred Remains-Myth, History and Polity in Belau*.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Money Walks, People Talk: Systemic and Transactional dimensions of Palauan Exchange*. *L'homme: Revue Francaise d Anthropologie* 162: 49-80.
- Sahlins, Marshall  
 1981 *Historical Metaphor and Mythical Realit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8 *The Stranger-King: Or Dumezil Among the Fijians*. *The Journal of Pacific History* 16(3):107-132.
- Shineberg, Dorothy  
 1971 *The Trading Voyages of Andrew Cheyne 1841-1844*. Pacific History Series No.3.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 Smith, DeVerne Reed  
 1983 *Palauan Social Structure*.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Stasch, Rupert  
 2009 *Society of others: kinship and mourning in a West Papuan pla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Tetens, Alfred  
 1958 [1888] *Among the Savages of the South Seas : Memoirs of Micronesia, 1862-1868*. Florence Mann Spoehr, tra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Tsing, Anna  
 1993 *In the Realm of Diamond Queen: Marginality in an Out-Of-Way Pla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Wagner, Roy

1974 Are There Social Groups in New Guinea Highlands? *In* *Frontiers of Anthropology*.  
Murray J. Leaf and Bernard G. Campbell ed. Pp. 95-122. New York: D. Van Nostrand  
Press.

---

## Facing Outsiders: Encountering with European traders from 16<sup>th</sup> to 19<sup>th</sup> century in Palau

Yuping Chen \*

### ABSTRACT

*In the previous anthropological study, researchers used to see the influences carried by outsiders as “interferences”, and also ignored how cultural subjects see “others”. This article will use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mingled with the understanding from fieldwork to investigate how Palauans treat “others”, and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category of “others” changed as European traders constantly visited Palau between 16<sup>th</sup> and 19<sup>th</sup> century, which brought about the change of culture and society.*

*Palau is located at the border of Asia continent and Pacific Ocean, and they belong to one of Austronesian speakers. In fact, Palauans were composed by different waves of “drifters” (*meleuaoch*), who had come to Palau by sailing or had drifted to Palau because of weather and current. When Palauans found a drifter, they would say “*al l chad e te mo chedak, e a l chelid e te mo cheduk*” (if you are human, you are our human; if you are a ghost [god], you are our ghost [god]). It means that Palauans used to accept drifters into their own society and become Palauans. Therefore, “drifters” was an open-ended category of people in Palauan culture. From 1570 to 1855, before Palau was colonized by Spain, there were more than 90 European ships had visited Palau. Most Europeans came to Palau to pursue economic profits, and brought Palau into world capitalism. When the massive European traders visited Palau, Palauans settled them in a separated island, Malakal, and called them *chad ra ngebard* (people from the west). This was different from their cosmology before: there are only human [Palauans] and ghost (or god) in the world. Palauans’ concept of people had changed, and formed another category of people, people from the west. The visiting of these European traders also entailed a new social relation: a contract relation. Europeans traders exchanged muskets and cannons with trepan, turtle shell and corpora under Chief Ibadul’s administration. To sum up, the coming of these European traders had entailed two kinds of changes. The first, the changing concept of “others”, from an open-ended category into inclusive and exclusive categories of people. The former one referred to those “others” who wants to stay in Palau and merged into Palau’s society through adoption or marriage. The later one indicated those who came here to trade and left*

---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and Cultural Affair,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yuping@nttu.edu.tw



*soon. The definition of “others” in Palauan culture is so flexible that it still enables Palauans to take “inclusive outsiders” into Palau’s society without interfering their own social and cultural mechanism, but also interact with “exclusive outsiders” as well. The second, they started a new social relation, the contract relation.*

*Palau is famous for their highly receptivity to difference cultures. However, this account can not depict the dynamic dimension of Palau’s culture, but just a hindsight. After investigating the historical literature with the understanding from fieldwork, I suggest that, we should take “otherness” into account when considering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formation. Especially in Pacific societies, the people who are master in sailing, therefore, there would be successive outsiders coming all the time. If we ignore the importance of “outsiders” in shaping the contour of culture and society, it would blind us from seeing the way of people’s grouping, also the connection between groups and cultures. Only by understanding the “otherness” in a culture, we can depict a more accurate picture of the characters of cultural change.*

**Key Words :** otherness, cultural change, identity, Palau, Austronesians